



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AUSTRIAN SCHOOL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IN REASSESS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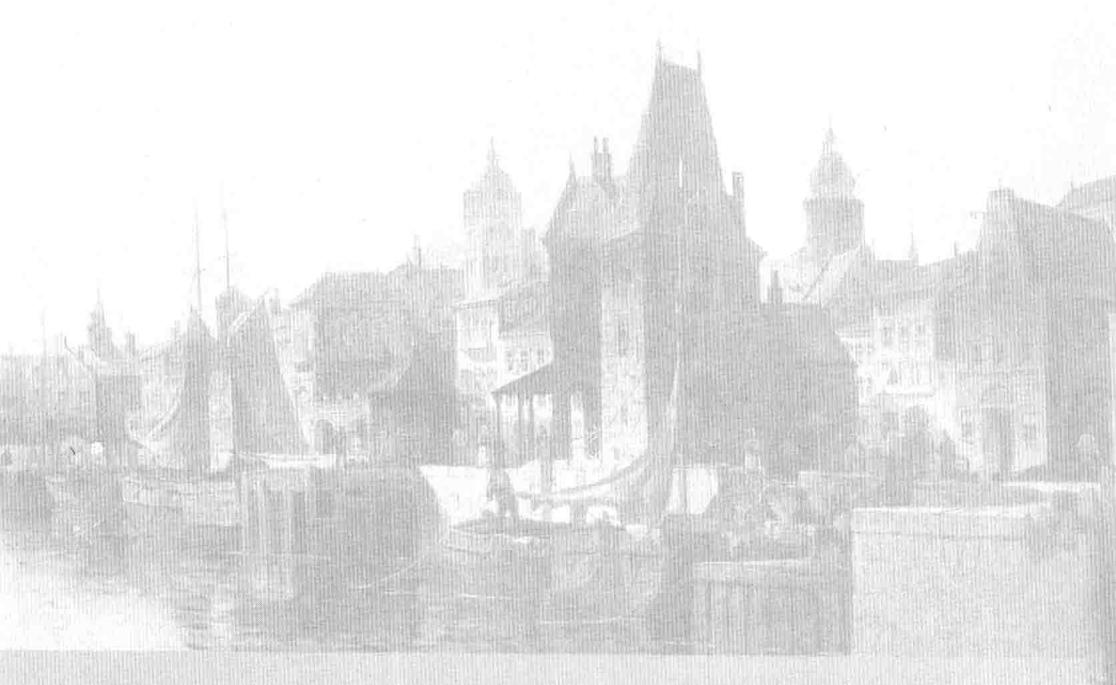
[丹]尼古莱·J.福斯 著
朱海就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奥地利科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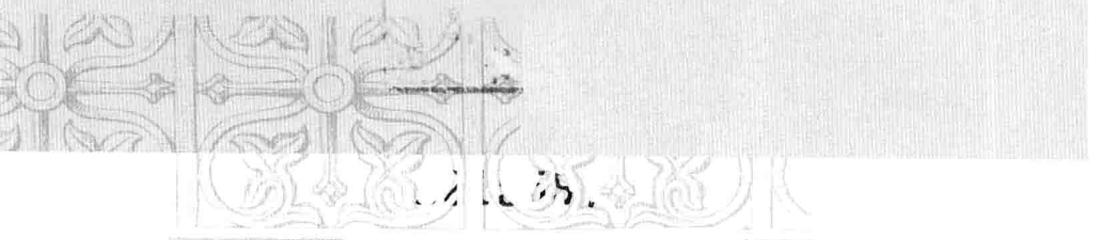
（英）詹姆斯·A·布坎南 著
王春生 等译



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AUSTRIAN SCHOOL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IN REASSESSMENT

[丹]尼古莱·J.福斯 著
朱海就 等 译



图字 01 - 2012 - 918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 (丹) 福斯著; 朱海就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161 - 3288 - 3

I. ①奥… II. ①福…②侏… III. ①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研究
IV. ①F091. 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441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李庆红

责任校对 任 纳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21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The Austrian School and Modern Economics: Essays in Reassessment

Nicolai J. Foss

© Handelshøjskolens Forlag 1994

根据哥本哈根商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本译出

中文版序言

二十多年前，我出于年轻人的兴趣撰写本书中出版的这些论文，那时我正在哥本哈根商学院撰写博士论文。当我还是哥本哈根大学一名学习经济学的学生时，我通过伟大的瑞典裔美国经济学家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的著作（在论述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那一章中，他的影响非常明显），发现了奥地利学派传统。他的著作把我导向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进而导向了米塞斯、柯兹纳和其他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以及一些有意思的同道，如布林·罗斯比（Brian Loasby）、理查德·兰柯路易斯（Richard Langlois）、乌尔里希·维特（Ulrich Witt）[更多的细节参见福斯（Foss, 2009）自传式的第一章]。大概在1990年左右，我感到对奥地利学派有些或多或少有点新意的东西要说，于是开始撰写这些论文。

在我写这些论文的时候，奥地利学派依然很令人兴奋，并有一种复兴的感觉。然而，我并没有全然接受奥地利学派的学说，而且对奥地利学派思想的一些要素进行了批评（这点在本书最后面的文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尤其是，我认为奥地利学派对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是被误导的。的确，战后时期见证了研究资源过度地投资在诸如一般均衡理论和总量理论等领域中，但是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方面正朝着奥地利学派所赞赏的方向

2 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发展。

特别地，在商业周期理论中，许多奥地利学派的主题得到了复兴；政治经济学上的进展表明，关于无所不知的、仁慈的独裁者的天真假设已经被更加现实的真实世界的政治家假设所替代了；博弈论意味着对选择情境和决策者之间的互动有更精细的关注，等等。在我看来，奥地利学派关注这些努力并参与到它们的进一步发展中去才是可取的。这正是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

这一结果是否已经发生是有争议的。我个人认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可能依然强调注解和批判，而忽视了理论的建构，其中一些人仍然坚持过时的立场。这是不幸的，因为奥地利学派当中依然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学习。我和彼得·G. 克莱因最近的著作（Foss and Klein, 2012）体现了这一点。

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朱海就，以及这本书的其他译者，他们用了不少时间不辞辛劳地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

尼古莱·J. 福斯

2013年7月28日

译 者 序

本书不是立足于“批判”的著作，而是强调“对话与交流”的著作，本书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称“奥派经济学”）和其他几个重要的经济学派进行了比较，但“比较”不是目的，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具体地说明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对话交流的可能性。这种对话与交流，不仅对“奥派”的发展，对其他学派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

本书把奥地利学派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中考察，使我们了解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所处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奥地利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独特性更得到凸显。

本书是一个文集，却有着逻辑一致的结构，简而言之，从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比较开始，作者指出奥派经济学早期具有某些新古典特征，接着，通过哈耶克与卢卡斯之间的比较，作者说明奥派如何脱离均衡分析框架，对“均衡”的怀疑自然地引出了“知识问题”和“产权问题”或者说“制度问题”。奥派经济学对知识问题的重视其实不是等到哈耶克才开始的，在门格尔的书中就已有体现。制度问题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共有三章，在这三章中，作者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现代新制度学是一种静态理论，这一理论忽视了奥派经济学重要的“过程”思想，今后应该向“过程的新制度主义迈进”。另外一章比较了

2 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正统经济学、奥派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价格的不同认识。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作者对奥派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如何取得进展给出了建议。

人们对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著名辩论都有所了解，但可能不清楚，对“跨期协调”的不同认识是他们之间分歧的根本所在。凯恩斯使用的是马歇尔的“当期”协调思想，如总量的供求分析，否认了市场存在跨期协调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凯恩斯比早期的哈耶克更多地看到了市场的非均衡性，而非相反，作者认为凯恩斯提出了关于市场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用奥派经济学后来的分析方法能更好地处理。还有，写《物价与生产》时期的哈耶克其实还是位新古典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和凯恩斯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新古典的均衡方法，只是到了后来，哈耶克才有转变，转变的标志是1937年写下《经济学与知识》一文。

哈耶克的转变，是因为他意识到包含了“完全预见”思想的跨期均衡方法是有问题的，不能用理解单个个体的行动逻辑，即“纯逻辑选择”去理解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假如用“纯逻辑选择”去理解个体组成的社会，那么所有重要的协调问题将被忽略掉。对“均衡”的怀疑和对协调问题的认识，促使哈耶克提出“知识问题”。“均衡”方法假定个体拥有关于“经济体系的结构”的知识，这就相当于把“个体的行动如何达成无意识的结果”这个社会科学的最基本问题排除在外了，而只有承认人的无知性，需要学习，才会有协调问题存在。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就在于过于关注“均衡”而忽视了“知识问题”，把社会现象简化成了个体的理性选择，把协调问题简化成个体的“最大化”计算问题，而这一做法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把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排除在外了。

从对“均衡”的怀疑，走向对“制度”的强调，在逻辑

上是自然而然的，奥派经济学的制度理论，较早地可见于门格尔对制度自发形成特征的考察，之后在米塞斯的产权理论和对官僚体制的分析中，以及哈耶克的宪政思想中有更为充分的体现，但奥派没有一个单独的关于微观层面的“组织”的理论，如企业理论，如作者所言，“奥派”其实已经具有了提出企业理论的所有素材，只是没有把它们组合起来，在本书中，福斯教授为建立奥派的企业理论进行了尝试。

如作者所言，奥派经济学预见了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先驱。但奥派经济学却遭受主流经济学界的严重排挤，这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比现在更快，而且更为健全”，比如，如果“奥派”的思想得到重视，那么以产权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不应该等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不仅如此，由于缺少奥派经济学的“过程”思想，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很大的漏洞。奥派经济学的独特洞见，对于改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使之更为健全是非常有意义的，如作者所言，奥派经济学可以起到提醒其他学派“它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的作用”。

但同样地，“奥派”也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汲取其他学派的长处，在这方面要向演化经济学等新的非正统学派学习。要保持开放性，就应避免过度地使用“否定的启发式”，这会导致自我封闭，对学科的发展不利，在作者看来，适当地使用“肯定启发式”和经验性的假设是有建设性的，作者并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擅长的“形式主义”，认为“奥派”不妨也可以使用。作者提出这些建议，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他认为“判断理论的标准，应该是能否很好地解决问题，或者说能否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这个开放性的标准为奥派经济学与其他学派之间开展交流和对话，从而推进奥派的新发展提供

4 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了巨大的可能性。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人们通常认为米塞斯的经济学完全是“先验的”，而作者告诉我们，米塞斯“并没有断言所有的经济学都可以从少数几条必然正确的公理中推导出来”（p215），米塞斯意识到，为更好地理解现实，使用经验性的假说可以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而霍普等人则把经验因素从米塞斯的经济学中完全排除出去，作者认为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作者尼古莱·J. 福斯（Nicolai J. Foss）教授现为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战略管理与全球化系主任、教授，校务委员会成员，挪威经济工商管理商学院战略与管理系教授，欧洲科学研究院（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小组成员，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本书英文版是福斯教授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最早出版的论著，该书出版时作者不到三十岁，但书的内容，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显得非常老道，比如体现了他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作者现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战略管理、经济组织（如企业）、企业家才能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似乎只有后两者是属于奥地利学派范围之内的，其他两个领域似乎不属于奥地利学派的范围，但其实他那些领域的研究也都是以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点为基础的，如奥地利学派对“知识”和“资源”的认识，他事实上是把奥地利学派延伸到了战略管理和组织问题的研究之中，这或许也是发展奥地利学派一种方式。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福斯教授本人的大力支持，他为译者澄清了一些不太好懂的概念，也欣然同意为本书中文版写一个新的序言。本书的翻译也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徐斌翻译了第五、七、九章，林小文翻译了第一至三章，朱海就翻译了第四、六、八、十章。张明勇和沈福康对部分章节作了校对，朱海就

译 者 序 5

负责全书的校对和定稿，译文的责任由我承担。感谢上述所有参与翻译的同仁，冯兴元先生、孟庆龙先生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庆红编辑及其他所有参与本书出版工作的朋友。

朱海就

2013年7月于杭州

前　　言

本书中的文章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尤其是对哈耶克和米塞斯经济学的持续关注、研究的结果。其中多数以前未发表过。最早的一篇要追溯到 1989 年，最晚近的一篇写于 1993 年。

很多人对这些文章做了评论。我要特别提及并感谢思拉恩·埃格特森 (Thrainn Eggertson)、杰斯佩·耶斯珀森 (Jesper Jespersen)、克里斯第安·克努森 (Christian Knudsen)、卡斯滕·A. 科克 (Carsten A. Koch)、默里·罗斯巴德 (Murray Rothbard) 和乌尔里希·维特 (Ulrich Witt)。约翰·墨菲 (John Murphy) 非常娴熟地编辑了本书。

第八章的部分内容发表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评论》上 (《企业理论：作为当代理论的先驱和批评者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第四章和第六章的部分内容最早发表于《经济与政治》 (*Økonomi og Politik*, 1990 and 1991) 和《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Sociali*, 1993)。对允许重印深表谢意。第九章主要是与哥本哈根商学院的克里斯第安·克努森教授的合作成果，非常感谢克里斯第安·克努森教授允许我收入不少我们合作的成果。最后，我想感谢哥本哈根商学院出版社的经理朗格·斯戴汀 (Lauge Stetting)，他最早建议我出版我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方面写的文章并始终给予支持。

尼古莱·J. 福斯

1994 年 5 月 11 日于哥本哈根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导论 | (1) |
| 第二章 | 经济活动的跨期协调:哈耶克和凯恩斯的 早期辩论 | (6) |
| 第三章 | 哈耶克与卢卡斯论均衡与知识 | (37) |
| 第四章 | 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 再审视..... | (58) |
| 第五章 | 产权经济学的先驱: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 (89) |
| 第六章 | 市场过程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 | (109) |
| 第七章 | 不同的价格理论:正统的、奥地利学派的与 演化的 | (138) |
| 第八章 |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 的例子 | (165) |
| 第九章 | 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科学进步 | (202) |
| 第十章 | 本书总结 | (231) |
| | 参考文献 | (237) |

第一章 导 论

尽管本书中大部分的文章都是独立撰写的，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尤其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预见到了现代经济学中一系列重要的发展。笔者这里说的“现代经济学”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经济学。因此，哈耶克在商业周期理论上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预见到了现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三章），而且他在跨期均衡方面的研究也预见到了现代观点（第二章）；米塞斯在产权经济学领域有很多深刻的洞见（第五章）；米塞斯和哈耶克两人也被认为在很多方面预见到了现代经济组织理论的主要观点（第四、五、六、八章）。最后，哈耶克和米塞斯最先提出的理解市场活动的过程方法与以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和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为代表的现代演化经济学方法之间有很多密切的关系（第六、七章）。

毫无疑问，这当中有一部分洞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其中主要是这个学派的三位奠基人卡尔·门格尔、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例如，熟知庞巴维克资本理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最先提出跨期均衡理论，这并不是巧合。也许从庞巴维克以时间维度为基础的资本理论到跨期均衡的一些观点并不是非常

2 奥地利学派与现代经济学

大的跨越。我们应该还记得庞巴维克论述了财产权。通常都认为，是哈耶克和米塞斯率先将过程方法用于市场活动分析（例如 Kirzner, 1973），但这一方法是理所当然地根植于门格尔的研究的（Streisler, 1972）。哈耶克研究文化演化方法的一些核心方面，在门格尔对同一主题的思考中已经有预见。

然而，尽管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很多研究可以追溯到他们的先辈，但是他们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完整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表述，诸如在商业周期、财产权、作为一个演化过程的市场过程以及制度等主题上。因此，他们的贡献最确切地预见到了现代新制度主义和演化思想。

如上所示，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中的多个不同方面都有预见。例如，通过哈耶克 1928 年对跨期均衡理论的介绍可知，他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他很明显又是现代新制度主义思想和演化思想的先驱。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要对此进行解释，需注意这一事实，即哈耶克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正统的均衡理论家，但是当他意识到均衡理论陷入一些严重的困境中之后，他转向了跨学科研究，这个领域也是他如今最为人熟知的（Foss, 1995）。第二章和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哈耶克早期作为均衡理论家的研究，其他的章节则讨论他后期的研究。

也正如上所示，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当时思想领域一股重要的推动力量。而且，笔者认为它是那么重要和那么具有推动性，乃至于至少应该把它视为和同一时期从欧洲大陆传播到盎格鲁 - 撒克逊世界的瓦尔拉斯主义同样重要，笔者这个观点当然会有争议。更具争议的是，笔者认为，如果这 20 年里出现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洞见没有遭到凯恩斯主义浪潮和正在兴起的瓦尔拉斯主义如此严重的排斥，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应该比现在更快，而且更为健全。例

如，产权和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并不需要等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才被重新发现，而是早就应该在主流经济学中被认识到。这样，制度也不需要等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经济学家提上议程。均衡的稳定性（或协调性）问题也早该占据中心位置，而不是一直被忽视。而社会主义经济学也肯定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诸如此类。笔者将在第九章论证，上面这些“实际上并未发生”的陈述暗示了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积极评价，但这种积极评价不能在同等程度上给予他们（大部分）的美国继承者。

哲学家彼得·斯特劳森（P. F. Strawson）有一句话经常被引用：为了理解某人的哲学先驱，他必须在他自己的时代语境下重构他们的思想。在经济学领域，笔者持同样的观点，这也是笔者给这本书取名“奥地利学派和现代经济学”的原因之一；并不仅仅是因为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预见到了经济学中一些重要的现代主题，也是因为笔者希望在现代的语境下去研究他们的观点，尤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演化多样性”（evolutionary variety）经济学（第四至九章）。这并不意味着笔者要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角度，对新制度主义和演化思想的学说史作一个统一的、一致性的阐述，而是通过现代经济学思维的使用，从奥地利学派的历史的角度，对这些学说的一些片段进行解释。

下面这些思想对笔者阅读米塞斯和哈耶克的主要作品是至为重要的：对跨期交易问题的强调、他们关于未来固有的不确定性的观点，市场是不断演化的过程的观点以及把制度和组织理解为适应由变化引起的经济问题而出现的设计的或非设计的实体的观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主题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地形成于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中；例如，哈耶克早期受瓦尔拉斯主义的影响颇深（一个例子是他因此并不认为未来